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桑兵自选集

桑兵◎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桑兵自选集

桑兵◎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桑兵自选集 / 桑兵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 系列二)
ISBN 978 - 7 - 306 - 06166 - 9

I. ①桑… II. ①桑…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8973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陈俊婵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周 玢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7.875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桑 兵

河北威县人，1956年3月生于广西桂林。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1977—1987年，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3年9月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92年晋升教授。1999年10月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1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到东京亚细亚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曾任汉城（现首尔）延世大学、台北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客座教授。近期主要研究集中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术、大学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关系史等领域。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编 委 会

主 任 慎海雄

副主任 蒋 斌 王 晓 宋珊萍

委 员 林有能 丁晋清 徐 劲

魏安雄 姜 波 嵇春霞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指明了方向。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广东要实现“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目标更需要充分调动与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要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提升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这次出版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就是广东社科界领军人物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现，是广东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的一项重要工程。

这次入选“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作者，均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2014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启动“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审，于2015年评选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10人。他们分别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毛蕴诗（中山大学）、冯达文（中山大学）、胡经之（深圳大学）、桑兵（中山大学）、徐真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修己(中山大学)、蒋述卓(暨南大学)、曾宪通(中山大学)、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这些优秀社会科学家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学术标杆。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根据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系列工程的工作安排,我们决定在推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的基础上,继续编选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

本文库自选集编选的原则是:(1)尽量收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专著中的章节尽量少收。(2)书前有作者的“学术自传”,叙述学术经历,分享治学经验;书末附“作者主要著述目录”。(3)为尊重历史,所收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尽量保持原貌。(4)每本自选集控制在30万字左右。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让读者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当代岭南学术名家的思想世界,领略其学术精华,了解其治学方法,感受其思想魅力。

10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中,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工作繁忙,但对编选工作都高度重视。他们亲自编选,亲自校对,并对全书做最后的审订。他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学风,令人肃然起敬。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了10位优秀社会科学家外,我们还得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将按照“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要

求，陆续推出每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把这些珍贵的学术精华结集出版，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之薪火燃烧得更旺、烛照得更远。我们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能迈上新台阶。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编委会
2017年11月

学术自传

◎ 桑兵

对于出版自选集之类的事，向来敬而远之。因为但凡拿得出手的论文，在当时均自认为有一得之见，况且分属不同领域和问题，很难说哪些才能够代表自己的水准。若是以时序为据，则学问随着功力的增长有所提升，越近的著述自然越显成熟。而所谓敝帚自珍，不必以老辣否定青涩，更不能时而引以为傲，时而弃如敝履。至于他人意见如何，或许各取所需，不在考虑之列。如果自选代表作，言外之意便有落选者等而下之之嫌。而学术自述，更加不敢轻易尝试。后来的倒述，即使力求客观，也不易如实。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被域外中国研究者视为个人学术经历的信史，反映了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轨迹。可是，深入了解具体语境便不难发现，其中不尽不实之处不在少数，充其量可以说顾颉刚的确想客观写出自己学术经历的变化起伏，而不能说其所写都是历史的真实。

有鉴于此，选编本书和撰写本文，都是依例而作，别无深意，无须过度解读。否则，超越的部分，便是他人的创作而非作者的本意。

一

我的历史专业学历教育分别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相应地指导老师先后也有三位。三所学校的风格不同，三位老师的学行稍异。本师之外，还有不少座师业师。能够经历变化，亲炙问学，博采众长，拾级而上，领略学问的丰富多彩，实为有心向学者的一大幸事。

四川大学是我的母校，报到虽然在1977年春季，我实际上却是1976级，也就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由于录取的办法是推荐而非考试，同学

的程度差异较大，可是在政治形势天翻地覆的鼓荡下，所有人如饥似渴地学习热忱，却远非现在的青年学生可以想象。第一学期，我就抄录了一整本赵翼的《廿二史杂记》，从中初步了解到如何从史书史料中发现问题。重获新生的教师，都焕发青春，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教学科研。那时尚未改革开放，他们首先想起“文革”前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并且开始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设法通过授课将学生引入研究状态。记得听课涉及岑仲勉先生《隋唐史》关于安西四郡的论述时，同学们居然能够发现并指出连任课老师也未察觉的书中的破绽。

专门化的取向之下，毕业论文的确定时间相当早。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较大，又与隗瀛涛老师有些联系，于是在定选题的双向选择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题目，并以擅长保路运动史的隗老师作为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论文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进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走什么弯路，按照隗老师的意见修改了两次，便基本得到肯定。而其他几位由隗老师指导的同学，运气似乎不够好，反复修改，总算过关。这次尝试进一步增强了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愿，同时也耳闻目睹了为人师表对待学生一视同仁的严格要求。

硕士阶段的业师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陈锡祺先生。“文革”前后，他一共招收过好几届研究生，每届大都数人，而我这一届，仅招到一人。当时陈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因而前后两届或组织培养小组，或与其他教师联合招收。只有我这一届，由陈先生独立承担指导之责。虽然平时也要求我向其他各位老师请益，论文修改时还委托陈胜彝老师协助审阅，但全程的培养指导，主要由陈先生亲力亲为。即使在陈先生到外地疗养期间，我也专程前往疗养院，当面聆听教诲。

入校后，我一直以“先生”相称，除了遵从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的惯例，还因为此前就读于四川大学，那里通常将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先生——即老师的老师尊称为先生。作为本师，以“先生”相称，主要是表示极其敬重之意。由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展相对较晚，在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陈先生都在长者之列，年龄、辈分各异的学界同仁，也尊称其为“陈先生”。

陈先生不仅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学者。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教学研究生涯，可以真正领略到学者的风范与坚守。学术研究不可随波逐流，要引领风气，而不被风气所推行，否则难免趋时者容易过时之讥。陈先生原来治古代史，20世纪50年代转而研治孙中山之时，这一领域还在相对冷清的环境之中。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局社会波诡云谲，常常冲击学术研究，而他始终坚持不懈，坚信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待到风云变幻，峰回路转，孙中山研究渐成显学，也始终沉潜，并不因此而躁进。后学者须继承学统，方能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今人好谈“接近国际前沿”，而且保持较快的“接轨”速度，结果“国际”何在，无从把握，舍己从人，反而迷失自我。其实大道无形，万变不离其宗，有定见，固根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做到这一点，须眼光抱负远大，有千秋万代的自觉，不必计较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陈先生几十年沉浸于孙中山研究之中，置身于喧哗的潮流变化起伏之外，坚守学术原道，将冷学问做热，将热学问冷做。治史亟需这样一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无须辗转反侧，自然处处皆是大道前沿。

作为近代史学界屈指可数的长者，陈先生具有老辈学人雍容淡定的气度。其中最令人感佩的，是君子不党、无欲则刚的风范，在任何情形下，绝不以学术为手段工具。学问在他即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此外无他。孙中山研究领域常有所谓饭碗之喻，虽然大都不过玩笑话，却从未听到陈先生沿用附和。他也从不以自己由学术而来的身份地位，作为与其他方面的利益交换。对于学术的判断，陈先生一概秉承公理公器的精神准则，不以个人的利害亲疏好坏影响评判尺度的公正。我读书期间性情执拗，有时难免固执己见，陈先生或许并不赞同，却不以为忤。

陈先生由治隋唐史转而治近现代，而民国时期中古史研究大家辈出，成效显著。陈先生曾先后在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校读书教学，受此浸染，其教法与做法，颇得中古史的高妙，与晚近史的一般通例有所不同。记得陈先生指引读书与治学门径，一曰以朱寿朋所纂辑的《光绪朝东华录》为入门读物，二曰用长编考异方法展开研究，并说明理由。后来逐渐体会到，二者既是史学起手入门的基本功夫，同时又是取法

乎上的大道所在。于编辑长编过程中四面看山地比勘参证各种材料，梳理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方能近真并得其头绪。此为宋以来“新史学”之不二法门，近代古史家的治学绝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取径办法，难免流于横逸斜出，如果不是在中古史的领域浸淫有年，很难对治史的正途大道心领神会。

陈先生于孙中山研究大热之际，适时要求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进行扎实的资料梳理与比较，使得后来的孙中山研究无法天马行空、任意驰骋，整体提升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难度和水准。我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并细心体味陈先生所说长编的用意，尤其是对他一再强调的须将孙中山的思想与其生平活动及交往相互印证、融会贯通这一点感悟颇深，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治学风格变化至深且远，也是后来指示新进的重要门径。今日学界无不推崇陈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就具体内容而论，其中固然有可以改善之处，就主旨方法而论，则确系颠扑不破，只是各自的领略有所不同罢了。

广东僻处岭南，学术眼界容易流于固陋。蔡鸿生老师的中山大学与山中大学之辨，即是此间治学须随时自觉不可乡愿的针砭。陈先生阅历丰富，接触过众多民国以来的学界胜流，耳濡目染，自然目光远大。我后来关注的重心之一，即晚清民国海内外中国研究者的学行，曾经几次聆听陈先生略谈相关的学林掌故，大都亲身经历或承接当事人陈述，颇为生动深入，非一般坊间传闻的浅表离奇可比。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这时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逐渐恢复，很想进一步求学。由于博士点相当少，记得整个高校系统只有章开沅先生一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导师，若想报考，一定要得到章师的同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之联系，得到肯定的答复和鼓励，使我信心倍增。这一步的跨越，是我治学道路上相当关键的转折。

用近代学人的眼光看，我也可以算是学问欲不弱的人。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天性的作用和少年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后来各位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引导或是带上学术的自觉之路。其间章开沅师的影响尤为关键。

第一次见到章师，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四川大学上学期间。当时《辛亥革命史》编撰组的一行人来成都开会调研，四川大学历史系邀请其中几位学者进行学术演讲。由于改革开放不久，教学秩序尚在恢复之中，正式的学术演讲有如凤毛麟角，一下子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学者演讲，求知欲日益浓厚的后进自然喜出望外。演讲安排在校图书馆的大阅览室，不单本系的同学蜂拥而至，其他各系的学生也闻风而来，图书馆的大门口早早地挤满了等待入场的听众，为了抢占座位，甚至挤坏了大门。本来相当宽敞的阅览室里座无虚席，人人脸上露出久旱逢甘霖似的期待甚至紧张。那样的空前盛况，令人感受到学术繁荣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

首场主讲人便是章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后来以论文的形式正式发表。也许章师已有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是这一次难以磨灭。首次领略大家风范，感觉自然不同凡响。

作为听众之一，尚无缘向章师当面请益。后来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因为同属中南地区，中山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之间的交往联系相当紧密，乘机机会，终于真正认识了章师，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还请章师主席。按例也算忝列门墙，成为门生了。

1985年初，我如愿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章师正担负着校长的重任，校务繁忙，社会活动也多，弟子们能够面谒的机会自然相对较少。或许是个人指导风格的不同，加上对几位同门的平均水准还算满意，所以章师更多关注的是结果而非过程。这样的方式对我后来带学生也很有影响，虽然看似无为而治，其实要求学生更加主动，毕竟已经是博士阶段，如果老师样样代劳，抱着是始终长不大的。

不过，虽然耳提面命的次数和时间有限，章师却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营造出一种氛围，使得每一位在此学习或工作的人，都倾注全力于治学之道。声声入耳与事事关心之下，学人的根本在于学术，千变万化，

心系于此，无论身份如何多样，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地显出书生本色。近代学术大家，从来不做学术行政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不必论，身兼要职的胡适、陈垣、傅斯年也同样如此，相关的口碑掌故俯拾皆是。这大概是处于学术领袖位置的大家影响良否的重要指标，也是维系学术命脉薪火相传的基本依托。

严格来讲，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位饭碗，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并不一定体现于夜以继日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而是整个生活和人生目的，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近年来，学界前辈感叹学人谈学术者日见鲜少（而学术成果却不断增多），彼此热衷的话题似乎逐渐远离学术，相比之下，章师老而弥坚的学术追求更加令人钦佩。我毕业后关注学者的历史，鉴于陈寅恪晚年转而潜心研究明清史事，曾经戏言检验学人是否对学术抱有真兴趣，可以看60岁以后是否还能开辟新领域。章师后来转向近代教会和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有特殊机缘，毕竟主观追求才是内驱力。如果不是感到极大乐趣，决无可能孜孜不倦地几十年如一日。

我辈愚钝，略有所长，只图在学术方面有所发展，而学术研究，尤其是治史一途，后天的努力固然极其重要，有些天赋却难以超越。章师便颇有研究近代史事的异禀。中国古代典籍向称浩瀚，与近代史料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主张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禁慨叹近代史料繁杂，很难囊括。因此，研治中国近现代史，必须有超强的阅读能力，一目十行也未必够用。而且在飞速浏览之下，还能高度敏感地捕捉重要信息。记得一次见章师，恰好他与图书馆约定前往圈阅选购的书目，便随同一道去图书馆。只见章师展开目录，目观指画，速度奇快，口中还不时与我交谈。我从旁仔细观察，所签出的各书，相当精当，不觉暗暗称奇。现在自己教学生，也强调高速阅读之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极端重要，否则，再小的题目也很难将所有史料一网打尽。

武汉的自然条件对于治学不是十分适宜，夏日酷暑，冬天严寒，又没

有降暑御寒的设备条件，章师开玩笑地说武汉的学生高考应当加十分。可是，就在小小的桂子山上，我却度过了三年温暖如春的学习生活，至今依然十分怀念。现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到处的物质和学术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可是，要想找到适宜的学习和治学环境，反而并非易事。

章师自谦是铺路的石子，实际上是那一代学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声望远超出专业的范围。章师治学，立意高远，大度兼大气，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专深的研究背后有一套大框架，从而将近代史研究的标的悬于高处，带动研究水准不断攀升。他告诫门下士不要只想在桂子山上称王称霸，应当向着国际学术界争一席之地。他的研究甚至有意避免局限于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乃至湖北，将目光投向江浙和海外。这种胸襟志向，为首先想着争夺身边地盘以称霸一方的山大王者难以望其项背。

学术领袖的眼界，对于学界风尚有着超越常人的影响作用。治学本来不必与人较，至少当与古人较，不得已而求其次，也须举目神州，放眼全球。而不断挑动内部竞争的学术环境，使得学人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势必钻营取巧，乃至胡作非为。章师面对诸如此类之事，决不意气用事，争一时的高下，而将挫磨当作激励，研究更加精益求精。学人无论身披多少光环，最终还是要看在学术史上留下的印记，是否经得起千秋万代的反复研磨。由老师的言传身教领悟到的这些体验，也是现在不断告诫门下诸生的要诀。

钱穆曾经批评近代学人志向不大，因而成就不高，但大志向不可凭空而来，如果坐井观天，即使放眼世界，也不过是井底之蛙。章师治学，不仅悬的高远，而且身体力行，其论著所体现的只是冰山一角，至于海平面以下的深厚基础，要通过长期的交往接触、耳提面命才能逐渐体察。当时虽已读到博士，思想和学术追求却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漫山跑野马。章师早年受过各种社会科学的辅助训练，也曾文史兼修，所撰写的影评还得到电影界高人的青睐。对于学生们的上下求索，总的态度是积极支持，有所创获，则表扬鼓励，哪怕只是一得之见。如果实在不着边际，也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几位同门各出奇招，章师百忙之中，从容应对，收放自如，令弟

子左突右冲而不逾矩。史无定法，但要取法乎上，并且中规中矩，不作门外文谈，绝非轻而易举。博采众长，固然重要，学有所宗，更不可少。后来见章师为各类书籍所写序言，不但内容吻合，议论精当，甚至文笔也可以随原书风格而转，没有相应的知识，绝无可能臻此化境。至于晚年犹辟新境，进取不止，更是令人感佩不已。

章师治学，接续前贤，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反对偏于一端。虽然辩才出众，撰写学术论文却不赞成对面驳论，而坚持正面立论。其意既然不以所驳之论为然，何必锱铢必较，虚耗精力。如果所论之事值得用力，则正面立论更能凸显价值。近代学术史上，彼此辩驳的文词交锋，每每流于意气相争，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有意求全之毁，借以出名，更加流弊无穷。章师此番看似不经意的议论，铭记在心，从此以后，再无论辩式的文章出手。

为师体大思精，可以从容驾驭门生，但弟子们守成的难度却大为增加。各取一端，等于肢解，如布罗代尔之后年鉴学派之名犹存，而整体史的博大精深无形中已经消散。可是勉强承受，又往往力有不逮。既要量力而行，又不能一味在扬长避短的托词下因陋就简，这对学人的智慧、功力和学识而言是极大的考验。治学须博而后约，基础不稳，植根不深，要想攀高做大，必然处处捉襟见肘。治学当叠金字塔，不要如雨后春笋。真正能够在学术发展史上“标新立异”，首先应当培基固本，温故而后知新。

二

导师之外，还遇到不少令人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

四川大学是一所名校，“文革”造成的创伤极为惨痛，硕果仅存的徐中舒、缪钺等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不再开设一般课程。但有时任课老师是他们的弟子，为了让后学一睹宿儒的风采学识，会特意请这样的大先生讲授一部分重要课程。记得中国历代制度就请了缪钺先生主讲，分为四次，每次两节课，从先秦到清代，一气贯通。尤其是关于清代制度集历代大成之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据说缪先生讲授这类课程，可以根

据时间长短而作详略有序的安排，并且始终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正式任课的老师虽已年过花甲，仍然自叹不能如此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缪先生文史双修，早年即在《学衡》著文，这时虽然刚刚开放，海外学词的成名学人已经不时慕名来函问学。课堂上拜见之后，可以定期到缪先生家中当面请教，亲眼得见古人所说过目成诵的情形。其时缪先生患白内障，已经多年不能看书，“文革”前他曾经过录明末一位诗人的诗集，十年间不曾翻阅，居然还能够背诵。缪先生展示其关于《红楼梦》史事的摘抄札记，并顺便谈及老辈治学习惯于分类辑录，似不如后来通行的抄卡片方便。由此开启了我抄卡片的兴趣，尤其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抄录了大量卡片，奠定了后来几本专书的基础。而在放眼读书之后，却逐渐体会到读完书再做学问的老辈分类辑录之法，较抄卡片更加有助于贯通发明，所以又改行简化辑录的办法。由此可见，学无定法，关键在于是否适用。

考进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是“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第三届。由于上一年未招生，所以对于中大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专业而言是第二届。这时全国能够招收研究生的师资为数不多，领衔者多为大先生，也就是老师的老师，如陈锡祺先生“文革”前就已经带过研究生。当年中山大学录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仅我一人，负责近代史教研室的陈胜彝老师参与阅卷和录取工作。后来他告诉我，对我的卷面回答相当详尽感到满意，也因而对其他报考者宁缺毋滥。

因为人少，不便开课，陈锡祺先生令我阅读《光绪朝东华录》和谢文孙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并随1977、1978两届的本科生听几门选修课，其中胜彝师的《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印象最为深刻。嘉道之际，刚好是所谓古代与近代的分界，因为分属不同的专业和教研室，习惯上截然分离，不相贯通。与一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讲法不同，胜彝师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讲述明末清初以来学术思想的流变，以及中外接触交往的历史，以说明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渊源。由于讲了半个学期，尚不到鸦片战争，有人质疑其是否序幕太长，枝蔓过多。其实胜彝